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有何根本区别？



提问：徐鸣春 河南省武陟市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

请问我们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所谓的“普世价值”有何根本区别？

解读：韩爱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面时代之变和世纪之问，创造性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理念指引。与此同时，个别西方大国罔顾需求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世界之变，奉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圭臬，执意搞小集团、拉小圈子，不断将世界推向撕裂、分化甚至对抗的边缘。向世人展现了自私傲慢的本性，也将境界高下立判的两种价值理念呈现在全世界面前。概括起来，全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之间存在着三个本质的区别。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价值源于实践，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形成的基础是全人类共同、普遍的生产生活实践。冷战结束后，高新技术和全球化迅猛发展，使得各国人们生活的关联度前所未有的，世界存在的形态发生巨大变化。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出现了三个“共同”：一是各国拥有了共同利益。比如，当前全球贸易的80%由全球价值链贡献，维护价值链的稳定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切身利益。而在大国对抗和霸权争夺的冷战时期，国家利益具有高度零和性和对抗性，要保证自身最大利益就必须在对峙中战胜对方。二是各国面临着共同威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再次让全世界意识到，人类真正的威胁是不分国别、地域和人群的，而是共同的。同时任何国家不可能单独应对威胁而独善其身。三是各国拥有了共同价值。世界各国在日益紧密的互动中认识到，各国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人类文明由大家共同创造，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人类文明存续才能有基础支撑；国家是平等的，只有在国际交往中做到公平和正义，国家平等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保障了个人民主与自由的权利，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可以看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球化发展到共同体阶段产生的一种价值理念，也是人类历史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的历史的必然产物，这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践源头有二：一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反封建的抗争意识和反宗教的世俗思想，对当时推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由欧洲拓展至其他地区，形成国际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以其武力的优势，越来越以文明优越自居而孤芳自赏，以异端定义与自己有差别国家，以强权政治、霸权逻辑开展国际交往，由此走向人类进步和历史发展

的对立面。封建主义早已不复存在，当今国际体系也已是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普世价值”的实践基础早已过时。进一步讲，“普世价值”是基于西方独特历史实践而形成的价值理念，不可能凌驾于所有时代之上，这是它无法为共同体时代的世界提供有益思想的根源。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追求的目标不同。价值理念的意义在于引领实践，首先是确立正确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论述明确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追求：一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摆脱以“零和博弈”为理念、以“结盟和战争”为主要互动方式的旧型国际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历史证明，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历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战争与冲突史，英国学者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一书中指出，欧洲列强在1494—1975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策动战争，完全没有战争的时间不超过25年。战争带来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也让无数人类文明成果毁于战火。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深层动因也在于避免人类文明因战争而衰落。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限性，重构以全世界为单位、以全人类为归依的思维方式，共同应对挑战、共同解决问题、共同创造多样化的现代文明。三是共同创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人类的美好未来取决于每个具体的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没有得到提升，他们的美好生活有没有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的是“现实的人”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不是“抽象的人”或“自然的人”的空洞关怀。这三个目标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一条鲜明主线：共建美好生活，服务人类进步。

西方“普世价值”所追求的则是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将之拓展到世界每个角落。西方国家拥有先发优势，但毕竟在国际社会中是少数，更多的成员还是非西方国家。如何才能持续地以少胜多、保持主导地位？除了提高国力和竞争力之外，西方国家的关键策略就是将“普世价值”作为向非西方社会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将非西方国家西方化。其逻辑是，国际秩序的核心构成要素是行为规范，而价值观决定着规范的具体内涵。这样一来，不管是谁只

要接受了“普世价值”，则西方阵营扩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就进一步扩大。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其真正内涵也在这里。可以看出“普世价值”追求的目标皆为私利而全无“普世”可言，更为关键的是，自确立追求目标的那一刻起，“普世价值”的全部价值就已表现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呈现，而再无任何理念可言，更遑论引领人类社会的新实践了。

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实现目标的方式不同。目标不同意味着方式的差异，关键是哪种方式符合时代潮流。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目标都有一个前提，即“共同建设”，这表明实现目标的方式是各国团结合作。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国际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部复杂精巧、有机一体的机器，拆掉一个零部件就会使整个机器运转面临严重困难，被拆的人会受损，拆的人也会受损”。共同体的行为逻辑就是团结合作，达成集体行动，共同应对挑战，提高各国的整体福祉。同时尊重各国的平等权利、发展差异和文明成果，这是团结合作的基础。

“普世价值”实现目标的方式则完全不同。首先，以“普世价值”为标签将世界一分为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的一项持久利益是“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也就是以“普世价值”来框定朋友圈。美国总统拜登则在首次正式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1世纪将是民主与专制对抗的世纪。这种二分法不是要寻找团结合作的对象，而是挑选需要将之西方化的对手。其次，自我标榜，将“普世价值”描述为优越的，是超过其他文明的，凌驾于一切时代之上，可以指引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以此提升“普世价值”的内在品质，便于在全世界推而广之。最后，对于非西方国家，强迫其接受西方的价值理念，大肆干涉其内政。西方国家往常典型的做法就是打着“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等各种旗号，不惜动用武力颠覆他国政权，然后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造”或“国家重建”。近年来则热衷于搞颜色革命，在对象国内部制造系统性危机事件，摧毁政府行动的合法性，为“普世价值”的渗透创造条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甚至不惜发动混合战争，先制造“可控的混乱”，而后通过再造和平、秩序恢复来塑造有利于价值观渗透的态势。事实上，这些手段不仅没有实现西方的预期目标，反而带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伊拉克在美国的重建声中沦为一片废墟；20年的阿富汗改造，带来400万人流离失所、270万人逃往海外。尤其让美西方苦恼的是，“普世价值”的暴力本质也由此更加难以掩饰。



习近平总书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六次重要讲话，语重心长、意味深长、情义绵长，不仅饱含着对年轻干部的关心与期许，也对年轻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对党忠诚是贯穿其中最鲜明的品质。作为一名从事医务工作的年轻干部，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与要求，葆有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守护人民健康的生动实践来履行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实在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志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我而言，体现在日常工作中以病人为中心，努力做到“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的一切”。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已连续11年位列“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专科榜榜首，源于她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光荣发展历史与优良传统，也凝聚了两代院士的呕心沥血与艰苦奋斗。吴阶平院士是北大泌尿外科的开创者，也是新中国泌尿外科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行医生涯始终满怀着热爱祖国、追求真理、服务人民的情怀；作为学者，他创造性地提出“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国际新观点，为肾结核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造福千万病患；作为师者，他倡导“实践、思考、再实践”，影响着一代代泌尿外科人的成长。郭应禄院士作为吴老的传承者，提出“爱国家、爱集体、爱专业、爱病人”的泌尿所“四爱精神”，号召泌尿人将自己对专业和病人的“小爱”升华到对国家与集体的“大爱”中去。郭应禄院士在20年前开启的中国泌尿外科人才培养“将才工程”，把我中国优秀的泌尿外科医生一千余人次分期分批地送出国外，学习国际先进泌尿外科技术。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所有知名的泌尿外科大夫基本都参加过“将才工程”。此项工程培养了国内新一代泌尿外科的领军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知名医院的泌尿外科主任都是“将才工程”的学员和受益者，郭院士用他的情怀和担当，带领中国泌尿外科向国际一流水平步步挺进。

对党忠诚不但融入老一辈的血液里，更刻入新一代的骨髓中。正是在吴老和郭老两代院士的精神感召下，我们泌尿外科晚辈有了奋进的动力和前进的方向，中国泌尿外科与欧美发达国家也从“跟跑”逐步转为“并跑”并迈向“领跑”。腹腔镜技术是上世纪末由西方欧美国家发明的，国内学者一直跟在他们后面学习和模仿。我带领的泌尿外科腹腔镜团队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改良并创新了腹腔镜手术“三孔法”前列腺根治术技术。通俗地讲，由于前列腺所在区域解剖复杂，手术空间狭小，不仅仅要切除器官，还要重建修复并保留功能，技术要求极高，手术如果出现并发症、尿失禁或者尿道狭窄对患者生活质量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痛不欲生，由此腹腔镜前列腺癌手术被誉为“泌尿外科手术的皇冠”。欧美国家的传统技术需要在腹部打五到六个孔，手术时间在两个小时以上。我们团队反复打磨关键技术，改良操作流程，突破难度壁垒，用属于东方人的智慧和巧手，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大大降低了手术难度和技术门槛。我们的手术仅需打三个孔，半小时内即可完成操作，不论是打孔数量还是手术时间都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我曾到国内两百多家医院和国际会议上作手术演示分享技术，使得原本不敢做、不能做、做不好的高难度

用守护人民健康 践行对党忠诚

□ 张 寒

手术成为大家容易掌握的常规手术，并吸引了为数不少的国外学者前来观摩学习。我们团队还将该理念进一步应用至泌尿外科常见手术，建立起“六步法”手术体系并出版学习教程，通过标准化的流程，让手术便于学习、便于掌握、便于评估、便于推广，让更多基层医师掌握腹腔镜微创技术，力求逐步消除国家不同地区医疗不平衡与欠均质的现象。除此之外，我们团队7年前开启了公益学术活动“一带一路腹腔镜行”，从兰州启程，远赴新疆，到过西藏，迈出国门前往尼泊尔，转战孟加拉，远赴东欧、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享传播腹腔镜微创手术技术，用公益情怀惠及当地人民，更让中国泌尿外科人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人民医疗保障的重大时代课题。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些都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为一名党员，我将牢记为民奉献，践行对党忠诚；作为一名医者，我将传承“北大医学”厚道之医者精神，以病人为中心，坚持医疗为民；作为一名医疗管理者，以求是为准则，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出色的工作诠释对党忠诚，为“国之大者”尽拱卒之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滨海医院院长）

正确看待“隔路的人”

□ 徐文秀

去，与他们广交朋友，融为一体。人民作家柳青扎根农村14年，与家乡农民融为一体，穿农民的衣服，剃农民的光头，看起来“比农民还农民”，以至于他站在一群农民老汉中人们都分辨不出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与人民群众“端端地”坐在一起、打成一片，同行同向、同心同德，成贴心人、暖心人、知心人，做同路的人。然而，对于那些搞歪风邪气、歪门邪道的人，特别是那些有贪腐行为的人，不但是要“隔路”，而且还要隔得远远的，就是要永远搞不到一块去。

与各种搞歪门邪道和贪腐行为的人“隔路”，是一种原则和立场。在是非、对错及好坏面前，人要有自己的原则，香的就是香的，臭的就是臭的，不能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现实中，有的人被私心杂念裹挟，被各种欲望诱惑，结果“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成了“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原则丢了一地，立场荡然无存，成了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一伙人。是非对错面前有态度、讲原则，取决于对客观事物有正确的认知，各种歪门邪道、歪风邪气和贪腐行为是错误的，是与党和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与

他们决绝是大原则、硬立场，不可暧昧、不能混淆。

与各种歪门邪道和贪腐行为的人“隔路”，是一种清醒和自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都得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难免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共同的目标”是维系彼此的纽带，本应该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无需走得太近、打得火热，甚至拉拉扯扯，结成小圈。在与人相处时保持一

定距离，不但产生“距离美”，更重要的是少了些是非非，少了些“瓜田李下”。无论为官还是做人，就是要有这种自觉、这种意识。

与各种搞歪门邪道和贪腐行为的人“隔路”，是一种风骨和清高。对于手中握有这样那样“公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围猎”的风险时刻存在，对于“私我者”“畏我者”或“欲有求于我者”，就是要保持警觉。“公权”在手意味着不是谁都可以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应该活出自己的清高和风骨来，不怕人家说自己太“清高”，不怕人家说自己不近人情，尤其是面对那些“污泥浊水”，得出污泥而不染。人可以合群但不可以合污，要合健康健康、清清爽爽的“同志群”，合老百姓“大众群”，让清高和风骨成为一道防火墙，成为一道屏障。

“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与各种歪门邪道和贪腐行为的人“隔路”，是需要点勇毅、果敢和笃定的，也是可以任性的，有时就是要特立独行、我行我素。不为“七情六欲”所惑，不惧闲言碎语所迫，方可行稳致远、不断前行。

前不久，有关关于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永恒的警示视频，披露了这名落马官员的贪腐心路，他说：“你收人钱了，人家觉得你是自己人，跟他一条心。不收钱是两种，一是你防范，二是你这人隔路。我也到营口这么多年了，别做隔路的人。”这套说辞当然是落马官员的借口，不必完全听信。但对于所谓“隔路的人”，却有必须要作具体辨析，以正视听，以免被错误的思想认知误导，甚至以讹传讹。

东北话里有一种说法，把那些看似“不合群”“有个性”，或行事风格与众不同、清高、特立独行的人说成“隔路的人”。现实中，到底该不该做“隔路的人”？如果可以，该做怎样“隔路的人”，又该怎么做去？

对于“隔路的人”，要两面说、得具体看。“隔路的人”，说直白点指的是那些不同类型的人、不是一路人，总是“隔”着一层、“防”着一点，有一种距离感。党的干部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与群众保持最密切联系，走到并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与人民群众不能、不该也无法“隔路”，必须经常走近更得走进群众中